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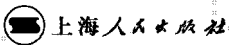
第六辑

观念与治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观念与治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念与治理/李春成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6)

ISBN 978-7-208-09485-7

I. ①观... II. ①李... III. ①公共管理-研究
IV. ①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460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第六辑 ·

观念与治理

李春成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246,00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85-7/D·1769

定价 26.00 元

复旦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FUD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2010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六辑 / 2010年

FUD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6/2010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或字母顺序排列）

陈汉宣	香港城市大学
候一麟	美国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
刘伯龙	澳门大学
马骏	中山大学
马国泉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张梦中	美国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周志忍	北京大学
竺乾威	复旦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陈晓原 扶松茂 顾丽梅 苟燕楠 敬义嘉 李春成 李瑞昌 刘淑华 林挺进
刘 晔 浦兴祖 孙君明 唐贤兴 唐亚林 郑 磊 周 帆 朱春奎 竺乾威

总编辑部成员

刘春荣 敬义嘉 陈周旺 张建新

本辑执行主编 李春成 **责任编辑** 赵荔红

目 录

编前语 / 李春成 1

专题:观念与治理

公共服务动机 / 詹姆斯·L. 佩里 宋锦洲 3

——访詹姆斯·L. 佩里

城市管理中的认知与观念 / 李锦峰 16

——摊贩“非法化”的由来及其出路

政策与观念：地方政府救市政策的支持联盟分析 / 陈家刚 29

治理理念的交锋：解读“仇和式治理”之争 / 李春成 钱培华 于兴波 54

理念与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的理念研究 / 刘圣忠 74

启示与迷失：新公共服务理论之思考 / 顾丽梅 86

治理实践研究

基于 VAR 模型的农业财政政策绩效评估 / 朱春奎 梁耀盛 耿育 97

中国环保 NGO 的政策参与 / 刘虹 115

坚持政社分开的理念，积极扶植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 / 陈晓原 125

地方政府高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实证研究 / 苟燕楠 陈元志 136

——以 PD 区为例

■ 观念与治理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与治理 /谢志岚 倪晓锋 149

——以三聚氰胺事件为案例

“简政”与“放权” /扶松茂 161

——“扩权强县”改革的思考

三十年中国行政改革动力变迁分析：复合演进的视角 /陈水生 176

其他研究

论行政学研究的基础和取向 /罗梁波 187

建构、嵌入与民主 /肖存良 211

——民主监督发展历程的政治学分析

编 前 语

李春成

任何治理模式与机制都有其深层的理念,不同的理念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 and 政策实践,有关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各种争议实质上是不同治理理念间的交锋。

围绕着“观念与治理”这一主题,本辑《复旦公共行政评论》共刊发六篇文章,依次讨论了公务员的服务动机、城市管理的认知与观念、公共政策的信念与联盟、公共治理模式的理论指南、强化国家治理体制的观念设计,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理念。

以詹姆斯·L.佩里等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务员并非像公共选择理论所假设的“经济人”那样只是为了个人私利而从事公共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正确的公共服务动机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理念是善治的观念基础;如果政府在招录和教育公务员时,重视和强化其公共服务动机,将从动机上遏制公权滥用和权力腐败。

李锦峰《城市管理中的认知与观念》一文揭示了政治观念和社会认知是如何影响城市“摊贩”管理政策和措施的。文章认为,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根本上源自对立的“摊贩”身份观念和社会角色界定,是摊贩追求他者正确、合理承认的过程。唯有从根本上转变对摊贩的认知和观念,将城市管理政策建立在承认政治和差异政治的基础上,才能把握摊贩管理的正确方向。

陈家刚《政策与观念:地方政府救市政策的支持联盟分析》一文中认为,我国房地产政策的各利益相关者由于各自不同的政策信仰系统而形成不同的政策主张,并由此构建不同的政策支持联盟;各个政策联盟围绕着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救市政策以及如何救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基于政策信仰系统而构建的政策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观念竞争显著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举措及其效果。

近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在争议着“仇和式治理”的是非、得失。正反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结果重要还是程序重要?“仇和式治理”是否属于“人治”;如果是人治,难道就应当否定吗?当个体权利与社会总体福利相冲突时,何者优先?李春成、钱培华、于兴波的《治理理念的交锋:解读“仇和式治理”之

争》认为,“仇和式治理”是功利主义公共治理理念在当代中国的一种典型运用,社会各界对于它的争议实际上是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治理理念之间的交锋。

理念是解释政治现象的一个重要变量。刘圣忠博士系统地梳理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念研究,揭示了理念与制度、理念和政策、制度和认同等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并阐释了理念对相关问题的影响。顾丽梅博士通过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原则和观点的剖析,揭示了新公共服务背后的价值理念(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以及这些新型价值观给公共管理实践带来的推动和挑战。

除了上述六篇主题论文以外,本辑《复旦公共行政评论》还收录了七篇有关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实践的研究论文,分别讨论了: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绩效问题,NGO的政策参与问题,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问题,地方政府高科技产业发展政策问题,我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与治理问题,我国“扩权强县”改革的问题和行政改革动力变迁问题。

最后二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国内行政学研究的基础和取向问题,以及我国民主监督的历史脉络和发展方向。

公共服务动机

——访詹姆斯·L.佩里

詹姆斯·L.佩里 宋锦洲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介绍个体层次上公共服务动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佩里教授针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现存问题、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相关理论依据、动机成本与收益、动机评价、研究本土化等议题进行了阐释。

受访人:詹姆斯·L.佩里(James L. Perry), 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教授。芝加哥大学公共事务学士,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事务学院公共事务硕士、博士。长期担任美国公共行政学会重要职务,多家公共行政学术期刊主编。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近年著作有《公民服务:会产生什么区别》(2004),《公民教育快速指南》(2006),《公共管理动机——公共服务的召唤》(2008)。曾获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创新人事研究“愈达-黑尼曼奖”、公共行政杰出研究“查尔斯·莱文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著名研究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杰出研究与服务“鲍·宛·瑞坡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德怀特·瓦尔多奖”。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服务动机、国家与社区服务、政府改革等。

采访人:宋锦洲,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访问学者。

时间:2008年10月23日下午

地点:印第安纳大学环境与公共事务学院

宋锦洲:下午好,佩里教授!感谢您的学术指导和接受这次采访。首先祝贺您荣获 2008 年度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德怀特·瓦尔多奖”,我想这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界最高学术荣誉之一。

佩里教授:谢谢!

宋锦洲:今天借此机会向您请教公共服务动机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您是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著名专家,请您介绍一些研究状况。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共服务动机如此重要?

佩里教授:在我谈论的问题中,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和美国的系络中公共服务动机概念有所不同。我所谈的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宽泛地采用了西方的概念,因为这涉及西方公众对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的期望。其中的一个期望就是对政府部门工作负有责任的人及非营利机构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理应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美国,我们回溯历史时经常会这样说——公共服务动机这是公共利益。为什么公共服务动机如此重要,我认为它隐含了“公共”定位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公共服务动机也与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的心理承诺有密切关系。我想,可能它对中国人民也很重要。中国人民希望提高他们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其他服务组织的能力,做应该做的和正确的事情。当然,这常常是很难的,有时要对民众使用很多规则,有时需要使用特别的控制。公共服务动机重要性的具体方面,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方面是担任重要公共职位的人倾向于代表公共利益;另一重要方面是,人们是被激励的,而主要的规则是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目的去做正确的事情。在西方社会,我们用历史的方法谈论,公共服务动机称作公共服务的行政伦理。公共服务应该对公共期望负责,对一般的公众负责。我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状况,但我相信很多国家正在经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他们在提供和增加公共服务投入,这是公共服务动机伦理的发展方向。

宋锦洲:对美国社会来说,公共服务动机存在问题吗?

佩里教授:我想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政府官员担任官职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他们担任职位是由于个人好奇心的原因,去为普通公民做好事。有时,他们是出于其他原因,如有些人预想金钱方面的回报,尽管当官是出于金钱回报的人与私营部门相比并不算太多。与私营部门比较来说,公职的财产收益回报并不具有很大的可预见性,其社会保障也是如此。历史地来说,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中国担任公职的人也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公民

期望被政府关心和照顾。有些人进入政府,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入政府他们就可以处罚别人,可以限制别人,可以辞退别人,尽管他们自己表现得很差。我并不是说这只是公共服务动机所存在的问题,然而,政府部门中确实存在着首先考虑自己的财产收益和社会保障利益的人。所以,公共服务出现的问题是,他们出任公职是出于错误的原因,享受公职所提供的工作社会保障,没有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是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对我来说,公共服务动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当政府机构进行组织设计和选拔机制设计时,没有使用并不十分聪明但心理上承诺公共利益的人担任公职。公众可以期望他们提供公共产品,以正确的行为做正确的事情。

宋锦洲:当前,公共服务动机有哪些研究议题?

佩里教授:总体上,公共服务动机相对来说是新的研究领域,我们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新的。大部分调查研究是近十年做的,尽管我们有很长的研究历史,即使美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和其他国家的研究,对公共服务伦理谈论了很多年,心理承诺也谈论了很多年。在经验研究方面,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测量公共服务动机,尽管我们有一些测量工具,但我们没有国际上通用的测量工具。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如在美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韩国,甚至在中国都进行了研究,但我们没有统一的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没有国际上无差别意义上的测量工具。另一个议题是,这些测量工具的具体差别是什么?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公共服务动机方面的文章,提出了“外在的绩效”概念。提出的问题是“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动机就能提高公共绩效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对此,我们并没有很多研究成果。对研究者来说,另一个领域是“我们如何建构和设计行政体系?”这就涉及公共服务动机驾驭人们的行为,并与传统的动机模型相结合,如动机保障模型。这些模型都与公共服务动机模型相竞争,它们都是人的行为的驱动因素。国际上应用的测量工具的一致性,以及测量工具与公共服务动机重要性的关系,这些都是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重要内容。

宋锦洲:公共服务动机研究有哪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佩里教授:我想,很难说有哪些新趋势。我可以列举一些新的领域,一些我想推动变化的事情。大多数研究是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我们去问公共部门的人一些问题,得到分值,结合其他测量工具,然后计算分值。然而,我们并没有做很多的经验研究。我们把调查对象分成控制组和对比组,我们对对比控制组和对比组之间的绩效差别。对研究方法论来说,这是理想的。当然,这只

是一种调查方法,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叫做“人——组织匹配”。“人——组织匹配”的研究认为,人在组织中表现越好,他的组织认同感越高,他的人格与组织匹配越好,他越是被组织表扬和认同。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及其他的激励研究认为,如果人们的激励是因为赚钱的话,他们就会很关心他们是否很赚钱,他们就会受到金钱的激励。如果人们的动机是因为公共服务的话,我们可以创造一种组织气氛,一种公共服务动机,他们也会受到很大激励。这样,我们思考一下公共服务动机,预设地思考一下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的特点。是否组织特点影响到公共服务动机,是否导致高的心理承诺和高的公共规范标、高的公共价值的组织活动。这些都是公共服务动机的源泉,也是组织强调和力图贯彻的事情。

宋锦洲: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目前您在做哪些研究?

佩里教授:我在做的一项事情就是公共服务动机领域的文献回顾研究,看看已经做了哪些研究,共有 125 篇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论文,还有一些对新研究的争论。关于这一主题,针对我所遇到的问题,我写了一本公共服务动机的著作《公共管理动机——公共服务的召唤》,詹姆斯·L. 佩里和安妮·杭弗刚姆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我试图回顾文献,例如,集中在我们已经做了哪些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另一项研究是汇集研究,几十项研究的汇集。例如,个人特点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是什么关系? 政府组织是否可以把人们引入公共服务动机的轨道? 我们已经有了多项研究,我们可以回顾文献,突出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哪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研究,哪些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就如美国国土安全研究问题那样,它迫使我们建立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变量相配合,以上这些问题是我试图重视的。对一些回顾研究和一些议题,几年前我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了文章,2007 年我与安妮·杭弗刚姆发表了《影响组织绩效的个人特质》,探讨组织的社会化如何用于做好公共服务动机。问题是在一些个案中,组织的社会化是否促进公共服务组织的心理承诺,哪些是组织的经验,在哪些层次上、哪段时间内能够影响公共绩效,这些议题是我所重视的。这些议题之所以重要,尤其是从政策的视角考虑,是因为哪些组织干预资源能够增加公共服务动机,哪些组织干预资源会降低公共服务动机。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值得公共管理者考虑和行动的,因为他们试图改善和加强公共服务动机,这会涉及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宋锦洲: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学者目前在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佩里教授:对于这个问题,上面我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大多数研究是以调查动机行为为基础的,涉及研究的测量,某一单元事件可能与公共服务动机相关,公共服务动机可能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在研究中试图寻求使用预设的公共服务动机因素预计组织的产出和结果。所以说,问卷调查的方法是普遍使用的途径。同时,我也建议思考其他备选方法,其中的备选方案之一是实验的方案。我们有控制组,也有实验组,我们试图在一些领域操纵一些变量。在这些领域,我们试图理解公共服务动机会发生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宋锦洲:您认为哪一个动机理论最有用?

佩里教授:我想在我的书中提到了涉及公共服务动机的一些相关理论。其中,我认为有一个理论相对来说占有优势地位,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动机文献中是这样,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德辛亚做了多年研究,基本上区分的问题是权力类型与内部设计动机。哪些内部动机因素受外部动机的影响。基本上说,他的结论是外部动机主要取决于个人。在某些方面,内部动机比外部动机的作用大得多,如获奖励、受尊重、受关照和内在化地施加影响。同时,他指出外部动机因素也可能挤占内部动机因素。所以,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外部动机因素是作用更大的动机因素,具有很负面的作用。如果薪酬体系是为外部和内部报酬所激励,它就会鼓励少付出努力、精明地付出。因此,我认为自我决定理论居于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首要地位。此外,学者菲耶在1997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并不是只为了钱》,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自我决定理论,他称为“正在拥挤的动机”。他试图分析内部动机因子和外部动机因子,主张外部动机因子要挤出来,要挤出内部动机因子。有时,他们也可以挤进内部动机因子,但这并不常见。这种文献是由经济学归纳的,即正在拥挤的动机理论,但就其理论基础来说,在文献中称作自我决定理论。

宋锦洲:目前,学者们在建构或完善什么样的动机理论呢?

佩里教授:我们正在构建的理论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动机理论。至于正在建构的理论,在其他理论和文献中,并没有以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名义提出。其中之一,我们叫做趋社会动机理论,这种动机是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在整个文献中都有趋社会的动机,很清楚的是,我倾向把公共服务动机作为某一社会阶层的趋社会动机。另外的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文献是关于利他主义的,即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更少地考虑自己的福利,这就是著名的利他主义理论。所以,我很难说这

些文献理论正在完善。我想我正处在汇集阶段,如公共服务动机、趋社会动机、利他主义动机,或者我称作其他相关的动机,它们都一起对人们产生影响。在社会更广的范围思考一下动机,我想那些可信的和备选的传统期望理论都可以作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就像它们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我看到了这些研究与其他相关人的行为研究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与自我利益相对照,或与自我方面对照,或与自私方面动机相对照,作为人的行为的驱动因素。

宋锦洲:公共服务动机与私营服务动机有何区别?

佩里教授:人的动机是在不同的部门里存在的。例如,会出现公共服务动机,也会出现私营服务动机。总的来说,我们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我在《管理学评论学刊》上发表了论文,是1982年我和瓦德孟·绕特合写的。文章探讨了公共系统与私营系统在影响动机方面有何区别。其中一个趋向是私营部门会出现一个强势动机,可能太强势了。例如,在工商部门工作的人比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工作的人更容易受金钱激励。这里的隐含是,如果你想赚很多钱,你可以去私营部门赚钱,尤其是你不可在公共部门赚很多钱和更在乎比别人富有。如果你更关心人类状况的改善,你可以去公共部门追求和实现。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工作,只是因为这是赋予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基本的行为 and 任务。所以,我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系统上的区别,它们具有巨大的、非终结性的区别,如动机在社会认知、在制度环节上的区别。当然,文献中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部分是由于强调人们的关注,在制度上有很大区别,尤其是政府组织和医疗组织比私营部门更具有凝聚功能。

宋锦洲:现实中,我看到很多人到公共部门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赚大钱,如当公务员就是想取得更大的个人利益。

佩里教授:是的,这在公共部门是存在的。但在美国公共部门中官员是不容易赚到大钱的,其他国家也许可以,甚至是一大笔报酬。其中的一个议题是腐败现象,如果政府部门的官员,了解到私营部门的规范是成本收益权衡,他们通过贿赂官员获得利益,那么,他们在私下交易中就会给予官员额外的报酬,官员就会变得很富有,我们称之为腐败。也许人们会说我们政府机构不想要那种社会行为,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只是满足他们的薪水,而不是预期在大的市场经济中寻求额外私利,然而,这种腐败可以找到实证性个人目标。但我们希望这种目标替换成代表人民的目标,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自我利益。

宋锦洲:这样说来,公共部门具有一定的假设条件,如果人们要在公共部门工作,就不可以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对吗?

佩里教授:对,是这样。

宋锦洲:高薪养廉对于激励公共部门人员是必要的吗?

佩里教授:我不能十分确定高薪养廉的具体含义。

宋锦洲:有新加坡政府的例子,也有香港的例子。

佩里教授:据我所知,新加坡、香港拥有很强的反腐败组织机构,不仅仅是给予公务员高薪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立反腐败机构拥有特别权力,这种机构建立在收入丰厚的基础上,以西方标准来说,他们享有额外收入。这种机构的创立旨在反腐败、打击腐败,所以,我认为高薪并不一定是敏感的。

宋锦洲:有人说,高薪是养廉的预设条件,您同意吗?

佩里教授: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想这是在伴随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理由并不充足。问题是当你的薪水很低时,这种情况下你会考虑不正当的途径。由于公务员想得到合理的报酬,他们有时会降低服务动机,会吃请,会受贿,牺牲公众利益为私营部门利益捞取好处。尽管海外有这样的薪酬方式,我不认为一定要有高薪体系。我认为要拥有一个好的报酬体系,同时要有个很强的监管机构。也许你可以争论说,一个高动机的组织价值观,公共利益的心理承诺不是为个人谋利。如果看一下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量表,公共服务动机的其中一个成分就是自我满足。你可以录用那些自我满足的人,在他收受物品、福利与巨大的公共物品相比较时,他的个人利益会放在公共利益后面。那么,你可以录用这样的人担任公共职位。同时,事先排除而不是掩盖那些追求高薪的人,使他们排除在公共组织之外。在公共部门不允许腐败的情况下,他们应该转向私营部门去追求财产回报,因为他们对满足自我利益有心理承诺。

宋锦洲:在通常情况下,公共部门雇员的绩效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当我们设计激励体系时,如何处理显性绩效与隐性绩效的关系?

佩里教授:我相信应该对公共雇员设立较高的期望。我所说的高绩效和很强的工作绩效一般是在他们事业的早期显现。有时,我们在辞退雇员时会说,你没有达到绩效水平的要求。然而,当雇员成熟时,他就会达到高绩效水平。这可能是西方的价值规范,与东方的价值规范并不一致。中国的价值规范给予年长者优待,然而,他们的智慧比起年轻人来说也许更会颠覆组织的体系。我想,我们应该改变很多的期望,从早期开始,从低职位开始就有高的期望,这样就不会出现显性与隐性绩效的问题了。(笔者注:由于中美国情和历史文化不同,对于显性绩效与隐性绩效的关系,美国学者有着不同认识,这还涉及其他制度系络的因素。)

宋锦洲:也许可以换用一个词汇,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

佩里教授:我想长期绩效对政府机构来说十分常见,尤其在官员开始掌权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有一定的期望,如两年或四年的任期。以布什为例,按照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能超过八年,他的父亲发现,他不能服务八年,只能服务四年,而人们所想要的是在四年中产生绩效。现实中,很多政治观点特别是评论,试图施加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他们要做出改变,做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迅速地去做。这就给他们一项行动接着一项行动的话语权。有时,行政机构试图标新立异,他们没有慎重考虑应该做什么事情,也许他们应该做得更少。政府做得更少也许以长远的观点看更好。他们做了太多的事情往往会使人产生混乱和紧张。真正地说,重要的事情才值得去做。(笔者注:由于中美国情和历史文化不同,对于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的关系,美国学者有着不同认识。)

宋锦洲:短期绩效好吗?

佩里教授:我的学生讨论过一篇关于领导力的文章,有一位著名大学校长说,领导力是关注状态的一部分。领导最好追随人们的关注,集中在两三件人们关注的事情上,而不是几十件事情。在克林顿竞选总统职位的早期,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集中在人们所关注的事情上。他的竞选口号是“这是经济,傻瓜的经济!”其含义是应该集中在懒人的经济方面。约翰·麦凯恩参加竞选的原因是他想维持一个长梦,但他做得很差。他具有全球眼光,他试图集有奥巴马的个性、经济问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问题,然而,人们所感兴趣的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他的领导不具备应有的高生产力,因为他的注意力分散在广泛的事情上,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事情上。(笔者注:由于中美国情和历史文化不同,对于短期绩效的认识,美国学者有着不同认识。)

宋锦洲:公共服务动机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哪个更重要呢?

佩里教授:我想,这个问题在我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模型中可以得到可信的解释。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对于公平来说,效率是次要的。

宋锦洲:为什么呢?

佩里教授:对于其他事情来说,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经常涉及分配物品和服务,减少社会的危机。公平比效率更重要,或者说公民享有服务更重要,因为它是公共的,而不是效率的。效率在保证公正方面并不具有同等重要性。效率是做什么事情时使用更低的成本,它不如做有利于全体公众的事情重要。就公平来说,政府的责任是对全体公民提供服务,